

經驗與觀念

渠敬东 主编

芝加哥学派书系 刘思达 主持



城市

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罗伯特·E. 帕克 等著

杭苏红 译

张国旺 校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經驗與觀念

渠敬东 主编

芝加哥学派书系 刘思达 主持

城市

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罗伯特·E. 帕克 等著

杭苏红 译

张国旺 校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美)帕克,
(美)伯吉斯著;杭苏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验与观念丛书)
ISBN 978-7-100-11678-7

I. ①城… II. ①帕… ②伯… ③杭… III. ①城市—
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8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验与观念丛书

城市

——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

[美]罗伯特·E.帕克 欧内斯特·W.伯吉斯 等著

杭苏红 译 张国旺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78-7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0.00元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Copyright©1925, 196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译出

总 序

黑格尔曾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最简单的经验即是最抽象的观念。这话乍听起来颇令人费解，然细绎之却道理很深。一个只能感觉世界的孩子，便只能用“这个”或“那个”来指代世界里的一切，他的经验看似最具体，靠的却是最抽象的观念。对人来说，经验和观念是一并到来的，没有靠纯粹经验活着的人，也没有靠纯粹观念活着的人。他的生活越具体、越深入，就越需要借助准确而丰富的观念来认识自己，去包容全部生活的内容；他的观念越多、越庞杂，就越需要依靠活的经验和历史来检验、来溶解。他知道，“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要在经验与观念之间往来穿行，行路与读书并行不悖，为学与为人是一个道理。他知道，仅凭经验来感知整个世界的人，是一种低级的动物，而仅凭自己一种抽象的立场、价值或信念来要求整个世界的人，也必落入一种“无生育力的亢奋状态”。他知道，米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了黄昏才会起飞，只有将现实生活的一切经验，与这个世界的不同起源和不同历史融汇一处，人类才会有未来。

“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为社会科学概括的一种基本方法。社会科学因应现代危机而出现，却不是要

取代已有的学问，而是要重新走进传统人文科学的腹地，将观念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经验世界，并升华为新的经验和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随着世界历史的到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他的生活乃至命运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都与整个世界无法分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成为了社会总体的一种现象呈现。社会科学自诞生那天起，就把她的研究对象看成是一种整全的经验体，杜绝用一种技术、一种成见、一种维度去看待哪怕最微小的经验现象。

不过，社会科学也很明白，任何现实的经验，都不因它仅是现实的而成为整全的经验体，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与很多人共同活着，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他在他所依恋的群体和组织中学习、工作和生活，他更是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承担着一个公民的义务……他必须给出这些共同生活的理由，知晓其中的道理，才能为塑造更美好的生活秩序而尽心尽力；他必须去研究公共生活的文明本体和自然原理，必须去发现人们曾经的历史怎样流变、演化和重建，必须去体会文明之“本”和历史之“变”怎样凝结于现实的经验总体里，进而塑造了他自己……一个现实的人，同他每一个现实的经验，都是人类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构筑的一个完整世界的映射，他就是一个融汇全部经验和观念的存在，也将照此来理解社会存在的一切现象。可以说，人的价值和未来可能的社会秩序，即肇发于此。

长久以来，在投入世界历史的每个时刻，中国人皆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经历着惊厥、痛楚、蜕变和失落，这条路走得艰辛、漫长，却充满着重生的期望。在复杂的时代变迁中，几乎

所有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要素都交织在我们的经验里，融合在我们的血气里。这种存在的样态，及其所内涵的非凡创造力，注定我们必为世界历史的未来有所承担。中国的社会科学将始终放眼世界，从不同的经验和观念体系中汲取养分，但依然尊重和守护我们自身的经验及其传统之源，正视这种经验和观念内生的原动力。中国的社会科学，必不被技术掠夺，不受体制裹挟，不唯传统是瞻，更不做国际学术和世界历史的尾随者。

本丛书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系统译介外国学人反思现代社会经验与观念的经典作品，二是编辑出版中国学者研究自身现代历史流变及当下社会经验的学术著作。

是为序。

渠敬东

于2014年岁末

人文与生态（代译序）

田耕

芝加哥学派是中国学界最为熟知的学术渊源，这与“二战”之前燕京社会学派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息息相关。1933年，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先生邀请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教授（Robert E. Park）来北平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讲授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正当盛年的芝加哥学派和迅速成长的中国社会学家有了直接的联系。帕克的讲座受到了比在美国更为热烈的回应，也影响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学者。帕克的燕大之行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研究路数与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连在了一起。

当时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的费孝通先生，不仅留下了关于帕克在京讲座的详细笔记，也记下了他对帕克所讲的社区研究的基本感受。^① 尽管费先生对帕克在中国城乡分野的研究设想颇有质疑，但他进入研究生后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即对广西花篮瑶的研究，却明确显示了他学习芝加哥式的社区研究的痕迹。和

①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同时代盛行于中国西南的民族—边疆的研究相比，费先生的著作敏锐地将汉族移民进入对瑶家社会的改变放在了社区变迁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流动、迁徙、移民和融合等主题，被富有想象力地从城市研究带入到了传统上被历史研究主导的民族边疆。^① 这个转移，在费先生留学英国归来，接替他的老师吴文藻主持“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之后仍然可见。^②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却催生了早期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些实践。

非常巧合的是，被吴先生所欣赏和被费先生带入到边疆民族研究的社区研究路数，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学派变革自身传统的产物。在进步主义之后的美国社会学，帕克和他的学生们通过对城市社区的研究，有力地改变了芝加哥乃至美国社会学的风气。这个改变如何而来，重要性在何处，是这篇序言想要介绍的。

不过，读者需要留意的是，虽然帕克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在知识上的贡献和影响力已被公认，但这个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却并不长久。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对学界，尤其是学术市场的震荡终结了芝大社会学对年轻的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统治。^③ 战后的芝加哥学派经历了一个接近 20 年的不定期，对芝加哥学派的继承和再创也在这段时间内摇摆不定。“二

① Liping Wang, “Disunifying the Nation” (working paper).

②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Charles Camic, “On Edge: Sociolog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in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242–243.

战”之后的第一个10年（1945—1955）哈钦斯校长（Robert M. Hutchins）在“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s）观念下对芝大社会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哈钦斯的主持之下，芝大的文理师资首次从一个校级的统一体变成了持续至今的四大学部并列的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本科生学院作为贯彻阅读经典最重要的机构，在芝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哈钦斯认为应该在这样一个学术的母题中孕育社会学这样的专门学问，而不是相反。因此，此前的芝加哥学派在机构上被分为社会学系和本科生的社会学学部。而后者在哈钦斯执掌芝大的10年中，显然是真正的芝加哥学派。引人注目的是，哈钦斯的芝加哥学派招收了很多认同伟大人文教育传统的社会学家，构成了一个为期短暂，但是影响深远的隐形的芝加哥学派。这其中包括了第一流的弗洛伊德学者瑞夫（Philip Reiff），深受韦伯影响的神学—历史学者尼尔森（Samuel Nelson），为中国学界熟悉的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和科塞（Lewis Coser），以及罕见地能在两个社会学系都能任教的希尔斯（Edward Shils）。^①哈钦斯离开后的芝加哥学派重新统一于社会学系。^②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持续到1970年代初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出任系主任的时候。贾诺维茨重新确立了社会学系的发展方向，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工作重新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学的左翼倾向和分支社会学的专门化在这段时间内并行

① Andrew Abbott,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ociology at One Hundr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7-39.

② 1962年被聘入系的以从事齐美尔研究主持的社会理论学者列文（Donald Levine）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隐形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人。

不悖。^①

《城市》是帕克时代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纲领性文字。这些文字在帕克来华授课之前的1925年就已集结出版，也随着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的起落而扬名和式衰。鉴于主旨和篇幅，这篇导言将集中在影响中国社会学最大的帕克时代，简略回顾芝加哥社会的传统，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芝加哥学派的含义，以及这本出版于90年前的老书的经典意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加哥学派给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强烈的转变。帕克和伯吉斯被大多数的社会学人和学科史研究者认为是芝加哥学派最卓越的导师。但在1920年代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的许多研究生却是从托马斯（W.I.Thomas）的巨著《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中汲取了研究灵感。^② 社会秩序在分化和重组之间的交替往复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母题。而托马斯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则代表了早期芝加哥学派对社会秩序及其治理相当历史性的关怀。对托马斯来说，基本社会秩序的组织化程度，而不是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才是社会学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种对社会“非组织化”（disorganization）的关心，一直延续到

① Abbott.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pp. 138-140.

② Andrew. Abbott, "Organization and the Chicago School."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Classical Found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00.

帕克时代芝加哥社会学的训练当中。^①

在托马斯那里的个体生命研究，和史学的研究一脉相承，通过对个体独特的生命感受力来描述“社会失序”的状态。托马斯是不折不扣的个体主义者。在他煌煌巨著中通过数量庞大的日记、通信等文件被呈现的波兰农民，是流离的生命共同体。波兰农民的经典形象，也闪现在机器轰鸣的匹兹堡（Pittsburgh）和春田（Springfield），构成了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下研究美国生活的象征。

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芝加哥社会学面对的是方兴未艾的社会调查。调查员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冲击的传统社会充满了震惊、不满和怜悯。“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和道德衰败随之而来，而调查员们深入社会问题的第一线，通过参与程度不同的田野工作和充满激情的描述，来揭示种种道德不毛之地的源起与现状。显而易见，美国的核心工业地带是社会调查的热点地区。

帕克对现代城市中的“失序”与“秩序”之间的流转往复同样关注，而城市中人不知疲倦的流动对帕克而言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命样态，但身处异乡的波兰农民的生命叙事，并不是帕克那里把握芝加哥这样的庞然空间的社会学钥匙。记者出身的帕克认为社会学一定要把握那些城市中飘零的个体结成社区的共同纽带，和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共同记忆。一言以蔽之，社会学的关键在于破解社区何以成为共同体的问题。

① Abbott. "Organization and the Chicago School", p. 412.

这样来看，帕克对社区研究的关注、强调和改造并不是偶然。但他主导的芝加哥学派也并不是重起炉灶。社区研究方法的生长和在帕克之前就已经进入芝加哥社会学视野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其核心是时间与过程中的组织。^①在一战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博士论文的研究并没有将美国工业化对社会组织、社区结构带来的社会冲击和道德后果看作是一个核心的题目。在20世纪的头15年中，芝大的年轻社会学家们仍然坚定地以城市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对象。^②这些积累当然也影响了成熟的帕克。但对初出茅庐的帕克却非如此。帕克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年轻的时候都在欧洲的一流大学里面学到自己日后研究的第一门技艺。欧洲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丛生的状况，刺激了许多帕克的同龄人，但怎么从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学问的新脉，是帕克们在从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毕业之后面对的共同问题。^③

“一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柔化了进步主义时代激荡的道德批评乃至左翼的政治风气。芝加哥社会学的经验母体—城市社区，此时也迎来了更为充分和复杂的组织发育和形变。恰在此时，帕克和伯吉斯的两位前辈——斯莫（Albion Small）和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以及才华横溢但我行我素的托马斯都离开了社会学系。帕克和伯吉斯的学术兴趣，导引了芝加哥社会学

① Abbott.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p. 7.

② Abbott. “Organization and the Chicago School”, p. 407.

③ 罗斯的著作更宽泛地介绍了一战后学科转型的形态，参见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24ff.

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次转型,这个转型从“破”和“立”的角度来看都有非凡的意义。^①从“破”的角度上来说,帕克和伯吉斯合著的两本著作:《城市》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导引》(*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强有力地批判了风行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调查。^②从“立”的角度来看,帕克和他最忠实的追随者深刻改造了芝加哥学派的田野工作模式,从而为城市社区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③帕克本人对城市中的族群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兴趣则给芝加哥社会学注入了新的经验血液。

当帕克1914年接受托马斯的邀请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之后,他首要的教学任务是“社会调查”的课程。这门课程对曾在新闻业有着不浅资历的帕克来说,应当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这一

① 正如兰诺看到的那样,“破”和“立”恰恰是《城市》的两个版本的主题:帕克在1915年撰写的同名长文是为《城市》这本书的雏形。在这片文章中帕克的重点不在重新确立城市研究的新路,而在于清理出社会调查这一传统的问题。而当十年后这篇长文扩充成书时,已经成为芝加哥学派当仁不让的新导师的帕克则重在阐明“人文生态学”的概念,参见 Pierre.Lannoy, “When Robert Park Was (Re) Writing ‘The City’: Biography, the Social Survey and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spring*, 2004, pp. 34-62。

② 迪冈的著作将芝加哥学派看作是美国社会学摆脱进步主义的社会调查风潮的象征,而帕克则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转折的核心人物,参见 Mary. Deegan, *Jane Addams and the Men of Chicago School*, 1892—191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8. 以及 Abbott.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p. 31。而在研究民国社会学成长的中国思想史学者那里,从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多少也是学派重造学科的另一典型,参阅黄兴涛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林德纳的研究则更为细致地将帕克和马林诺夫斯基代表的民族志传统关联起来,这对于理解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成长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参见 Rolf.Lindner, *The Reportage of Urban Culture: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段经历恰恰培养了帕克将社会调查和“芝加哥”社会学分离开来的决心。帕克对其同时代带有调查色彩的城市社区研究近乎冷漠的疏离预示着他改造这个流行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研究思路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帕克和邀请他来芝大的托马斯并无分歧。^①

对 1880 年代到 1920 年代影响芝加哥的巨大移民潮的观察和研究是促成帕克等人改造芝加哥社会学的第一个历史契机。^② 城市的发展对社区，尤其是移民群体和从事特定工作的工人群体的聚集形态具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些社区对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文化延续和社会关系的再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大量移民的加入及其所带来的融入问题（assimilation）即使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调查，比如“匹兹堡调查”（The Pittsburgh Survey）中屡见不鲜。但帕克认为社会学应该提供一种新的科学去探索这一美国社会的大问题。在帕克看来，这门新的科学可以揭示出城市人口和位于城市空间的各种体制、设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结合的过程，是帕克所谓的生态组织化的过程（ec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city），而这一结合的结果，是城市成为一种心物合一的机制（psychophysical mechanism）^③。要研究这个心物合一的机制，人类生态学这个新学问需要弄清楚其两个基本面向：城市的物质结构和道德秩序。^④

① Lannoy, “When Robert Park Was (Re) Writing ‘The City’: Biography, the Social Survey and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p. 39.

② Robert Park, and Ernest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pp. 28-87.

③ 参见本书第 6 页，下文凡引述本书的内容，皆为页边码。

④ 参见本书第 8 页。

城市的道德意义和进步主义时代社会调查所秉持的道德观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城市社区之居民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民风（*mores*），也就是说，人群在城市中变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各个社会群体的习惯、流动和相互关系，构成了城市社区这个整体。而在帕克的前辈们，即社会调查的积极实践者们看来，城市的道德出现问题，根本在于城市的下层人群——无论是从财富分配，机会分配或者种族的观点来看——缺乏支持和资源。正因为身处不同社区中的人意味着在不同的民风里面成为不同的人，帕克认为此前由社会工作者和调查性的新闻田野工作承担的的社会调查虽然充满了批判意识，却不能揭示出城市作为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本底蕴。^①

因此，与其说帕克对社会调查的“反动”是要弥补之前社会批判色彩浓厚的调查所缺乏的“科学性”，不如说是他试图寻找移民大潮冲击下美国都市的民情的根本基础。这一点，帕克和他在德国学习时期的老师齐美尔一样，毫不犹豫地以为陌生人这个形象作为他寻找的新学问的起点。城市中最基本的民风，就是建立在熟识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被陌生人之间形成的次生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hip*）所冲击并因此而趋于解体。^②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场”体现的正是初级社会关系

① 帕克对 1910—1914 年凯洛格（Paul Kellogg）主持的匹兹堡赞赏有加，这很大程度上出于后者在新闻报道的卓越性上，而这种卓越性恰是帕克认为社会学研究所需要借鉴的新思路。

② 参见本书第 19—25 页，不过，帕克并不认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次生的关系注定只是后者取代前者那么简单。在 20 世纪初级的芝加哥政府中，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的实质，恰恰是在日益形式化的政府机构中树立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并用这种帕克认为封建性的人身关系来控制组织上日渐“非个人化”的政府机构，参见本书第 35 页。

在现代社会中的解体过程。这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支持传统社会关系的“道德秩序”，这是帕克想在研究城市的新学问中探究的问题。也是在实际转折时备受“社会问题”困扰的大西洋两岸孜孜以求的新路。^①

二

帕克的社会学探索并没有执着于铺陈齐美尔的灵感。在他看来，这种次级关联的出现和城市中的流动性（mobility）密不可分。流动性也成为《城市》这本文集乃至帕克时代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核心词。伴随着不可抑止的流动性，“城市人口中的那些来去随意、流动性强的群体一直面临着无休无止的焦虑，他们不仅受到每一次新思潮的鼓动，还总感到一种持续存在着的恐慌，从而使社区始终处于某种危机之中”。^②这一流动性和城市中日臻完善的媒体和交通相关，但它却使得原本会造成传统社会崩裂的“紧要关头”日益成为城市人口的日常，帕克看得很清楚，“在人群与公众当中，他们所处的每时每刻都可被称为“紧要的”（psychological）”。^③正因为帕克将城市中的紧张，危机和紧要的时

① 在《城市》一书的另一作者伯吉斯看来，城市生活成为经典社会学家那里的重要关注对象，恰恰是因为在城市生活中能找到所有“社会问题”的最为剧烈的形态，见本书第47页。关于世纪之交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参见 Daniel.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参见本书第20页。

③ 参见本书第18页。